



熊映梧经济思想研究

徐 旭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熊映梧经济思想研究

徐 旭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熊映梧经济思想研究/徐旭编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 - 7 - 5161 - 8925 - 2

I. ①熊… II. ①徐… III. ①熊映梧—经济思想—研究
IV. ①F09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171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特约编辑	林 木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310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熊映梧先生是中国生产力经济学主要创始人、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

近 20 多年来，在他生命的黄金时期、治学生涯的辉煌时期和硕果累累的贡献时期，这位龙江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精英，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一位资深的老经济学家称赞他是“中国改革与发展时代经济学界的一颗新星”。

1929 年 10 月 3 日，熊映梧出生在“唯楚多才俊”的鄂西松滋县的一个小镇。在那里，他上过私塾和洋学堂。1943 年，熊映梧念初中的时候，日本鬼子侵犯鄂西一带，他被迫去了重庆，入国立第二中学读书。抗战胜利后，几经转折和艰难寻求，于 1949 年 3 月进入华北大学。经过短期学习，1949 年 10 月，被分配到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工作，这所学院后来成为黑龙江大学。做了四年行政工作，看到轰轰烈烈的全国经济建设高潮，他坐不住也沉不住气了，异想天开地想当一名经济学家。其实，这是他少年时期扎根于心的一定要推翻“三座大山”和科学救国鸿鹄之志的必然展现。

在那个百业待兴和人才奇缺的年代，先干后学、边干边学和干中苦学是常态。熊映梧更是这样。他教了三年政治经济学之后，于 1956 年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两年毕业后获得本科学历证书。1962 年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研究生班又研修一年。

同济和学生们问他：您是怎样成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大经济学家的呢？熊映梧的回答很简单，“伟大时代的造就，同仁真诚的帮助，个人不懈的追求”。

熊映梧在《中国经济学之根在本土》论文中指出：“一个有出息的士兵要有当元帅的壮志。同样，一个有大志向的经济学家，也应有成为世界一流大经济学家的宏愿。”当然，立下了雄心壮志之后，就一定要

坐得住冷板凳，不急功近利，而是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不懈追求，不获成功绝不罢休。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宏大愿景，他才成就了一名经济学家。

熊映梧先生的学术生命 1978 年才开始。他花了 25 年的宝贵时光，走过了“模仿—彷徨—彻悟—创新”的漫长道路。在 50 岁那年，他感慨铭心地写道：“坎坷半世心不衰，腰弯骨损志不改。拼将余生著新说，毁誉存亡置度外。”事实上，他不仅是“拼将余生”，而且是拼搏其一生。

熊映梧先生的经济思想集中、鲜明、深刻地体现在其诸多著作之中。如生产力经济学系列的《理论经济学若干问题》（1988 年荣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生产力经济概论》（1986 年荣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生产力经济学原理》（荣获 1988 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一等奖）《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考察》（荣获中国生产力学会 15 年优秀成果特等奖）《适度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对策》（荣获中国生产力学会 15 年优秀成果特等奖）和《中华民富论》等，以及《用发展观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熊映梧集》《熊映梧选集》《市场经济与国企改革》和《为新时代经济学催生》，等等。

打开熊映梧的著述不难发现，经济观、改革观、发展观、增长观、产权观、国情观、系统观、民富观和整合观等，出现频率非常高。正如韦森在《重读哈耶克》一书中指出的：“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熊彼特也曾说过：“意识形态愿景的持续存在是件好事，因为如果没有学者们努力工作的愿景，任何科学都不会出现新的进展。”熊映梧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与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在科学的和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如此相同、相通和相融的经济学家。

可以说，熊映梧教授众多的论著，都是他运用科学的整合观和整合法进行研究的辉煌成就。《中华民富论》就是他生产力经济学“六部曲”的整合，是博大精深、具备世界名著特质的经典整合。《为新时代经济学催生》一书，更是经典文选系列整合的范例。从创建中国学派的新时代和新世界的新经济学愿景来说，更是超越了《中华民富论》的大整合。没有整合观、整合法和整合力，是难以成就任何重大创新

的。因为不经过整合和再整合过程，就不可能出现任何创新或创造。

熊映梧先生经常说：我是中国经济学派，除参与创建生产力经济学、提出《中华民富论》之外，还攻克各种难关，积极创建新世界、新时代和新世纪的有中国特质的新经济学，以解决改革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大课题。我完全相信，经过几代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在 21 世纪一定可以创建成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经济学流派，以期更好领导、整合、凝聚和促进拥有中国特质、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经济学家队伍，从而成为经济学家新时代的全球经济学家大国。

走在时代前列的经济学家熊映梧先生，早就看到了经济学家的生存和发展规律。这也是他为什么不厌其烦地再三呼唤，不畏艰险身体力行地勇于实践、履行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一直在创建龙江学派和中国名牌经济学家队伍的根本原因。

2015 年 4 月 8 日，是熊映梧先生逝世 12 周年祭日，我们谨以万分怀念、极为崇敬的心情，将他在中国经济学派的理论贡献和经济思想，尤其是他对龙江经济学人的深远影响，著述成书敬献给他。

粗略地统计，熊映梧先生学术著作 18 部，学术论文 200 篇，论著总共 600 多万文字。本书通过十二章内容来研究、评价和鉴赏这位龙江著名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和卓越贡献。尽管本书编撰收录的内容并不能涵盖熊映梧先生的全部文献，但基本囊括了体现熊映梧先生经济思想的主要和重要文存。

俄罗斯哲学学会第一副会长 A. H. 丘马克夫曾说：“哲学是某种最宽广的、超出自己学科范围的对于该学科的对象及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的整体性观点，它同时也反映了其他知识领域的最高成果，离开哲学，无论是重大发现，还是整个学科本身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为此，本书用了三章篇幅，全面、系统地总结和归纳出熊映梧教授经济思想中最具哲学认知、哲学提炼和哲学思维的三观，它们分别是第一章熊映梧的经济观、第二章熊映梧的发展观和第三章熊映梧的改革观。这三章都是从哲学视角来学习、研究、认知、评价、阐释和总结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熊映梧教授在成功创建生产力经济学、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为中国改革发展创新等作出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功绩，更是熊映梧先生经济思想在哲学层面的集中体现。

为了更好地研究和理解熊映梧先生的经济思想，我们沿着熊映梧先

生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轨迹来认知和鉴赏他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从第四章早期三部著作的再评价,第五章第一部生产力经济学理论著作,第六章中国第一部社会生产力考察专著,第七章中国结构优化的适度经济增长论,直到第八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有企业改革论,都是为熊映梧先生一生追求的整合之作,即第九章中华民富论所做的经济思想和理论研究的长期积累和准备。熊映梧先生就是一直秉持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紧紧抓住生产力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在充分考察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必须通过实行“结构优化的适度增长”,最终实现中华民富伟大目标的龙江经济学派带头人。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全球化整合发展的新时代,熊映梧先生不仅在其五卷论集中应用整合观和整合法,更是为创建新时代和新世界的经济学“拼尽一生”。他在第12届世界生产力大会演讲中说:此次得到世界生产力科学院的肯定,授予我院士称号。我把它看作一种鼓励,看成一个新的起点,我要拼将余生,继续做一个与新世纪俱进的经济学家,余生全力研究新千年经济学的头号课题——“改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上内容集中在本书第十章用整合观整合法创新新时代经济学和第十一章当选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之中。

第十二章以探索规律 揭示真理 创建理论为崇高使命,通过社会各界对熊映梧先生评价及缅怀文献,表达对老先生的崇敬,激发龙江经济学人继续创业创新的历史责任。

“自从亚当·斯密奠定了经济学的学院地位以来,经济学一直作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而光彩夺目了二百多年,直到今天仍然为政府和大众所注目。每个人都期望把经济学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现实问题,尤其是当一个国家遭遇经济难题的时候,这种期望往往会更加迫切,甚至期待着出现如同救世主一般的经济学家和经济理论……我们为历史上伟大的经济学家们的卓越贡献而叹服,更为这些努力却没有收到良好的效应而惋惜。”^①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龙江这块土地上进行的恢宏、丰富、深刻的伟

^① [德] 尼格拉斯·庇巴、维夫赫德·海兹主编:《46位大经济学家和36本名著》,70年代俱乐部翻译工作室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97页。

大实践中，历练、造就、涌现和提升了以熊映梧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经济学人。他们的理论研究、学术思想和社会贡献令人惊喜不已。这就使我们必须尽快地全面研究龙江经济学人的重大贡献、精神境界、成长规律、人生价值、名牌效应，共同创建、集中再造龙江经济学人群体、流派和能级，以期充分发挥其整合效应。这也是经济学大师熊老先生的生平遗愿！

目 录

第一章 熊映梧的经济观	1
一 《我的经济观——生产力首位论》	1
二 三十年观察与思考的结论：必须牢牢抓住发展 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	3
三 第一次标新立异：提出生产力首位论	5
四 第二次标新立异：主张“用发展观研究《资本论》”	12
五 创新和务实：经济学家不可缺少的两个品质	16
六 余生的奢望：创作《中华民富论》	19
第二章 熊映梧的发展观	23
一 六个再认识	23
二 重新研读《用发展观研究〈资本论〉》	26
三 再度反思《再谈用发展观研究〈资本论〉》	33
四 经济科学大发展的关键在于面对现实	36
五 建设新世界的经济学构想	38
六 马克思主义大发展的目的一定会实现	42
附录：熊映梧向《资本论》研究提出商榷引起的风波	47
第三章 熊映梧的改革观	55
一 市场经济观	55
二 中国经济增长观	58
三 经济改革观	64

第四章 早期三部著作的再评价	77
一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综合价值	77
二 《理论经济学若干问题》的科学价值	85
三 《生产力经济概论》的创新价值	90
第五章 中国第一部生产力经济学理论著作	100
一 跨越时代的主题和跨越世纪发展的名著	100
二 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102
三 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系统论	107
四 生产力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整合论	111
五 生产力经济学的由来和发展	115
附录：生产力经济学的由来和发展	115
第六章 中国第一部社会生产力考察专著	119
一 新中国 40 年经济发展的纵向考察	121
二 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横向分析	123
三 中国社会生产力运行的国内外环境	128
四 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总体评价、预测和对策建议	132
第七章 中国结构优化的适度经济增长论	137
一 《适度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对策》的时代价值	137
二 创立“结构优化的适度增长论”的历史背景	140
三 适度经济增长的客观必然性	142
四 适度经济增长率的界定	144
五 投资与经济增长	145
六 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	148
七 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	149
八 经济增长速度与“瓶颈”问题	150
九 分阶段多层次的适度经济增长	151
十 实现适度经济增长的机制	153
十一 结论	154

十二 研读《后记》的思考	156
附录：改革要坚决 发展要稳健	159
生产力三部曲与适度经济增长论	163
第八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有企业改革论	167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有企业改革“三部曲”概论	167
二 国有企业改革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论	172
三 国有企业改革与公民产权本位论	174
四 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转换论	178
五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跨世纪的难题论	180
第九章 中华民富论	184
一 历史经验回答了富民强国的康庄大道	186
二 实现民众共富的社会主义目标靠大力发展生产力	193
三 有出息的经济学家应当研究中国最大的问题	198
四 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使中国人富起来	200
五 对《中华民富论》好评如潮	202
附录：中华民族怎样才能富裕起来	
——读熊映梧教授新著《中华民富论》	205
第十章 用整合观整合法创建新时代经济学	212
一 五卷论文集的创新整合观整合法	212
二 熊氏“天人合一”的经济学观	220
第十一章 当选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	227
一 拼将一生著新说的经济学家	228
二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经济学家	236
三 率先研究新千年经济学头号课题的经济学家	240
附录：全国绿色生产力研讨会综述	244
第十二章 以探索规律 揭示真理 创建理论为崇高使命	250
一 良师益友的典范 龙江学派的旗帜	250

二 不幸病逝	255
三 名垂青史 万古流芳	266
附录：钱学森给熊映梧的两封信	275
新中国 50 年经济曲折发展的反思	277
一 首先要认清国情	277
二 50 年的经验：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是唯一的 富民强国之路	279
三 公民产权本位论	281
四 向市场经济过渡都有一个“原始积累”阶段	282
五 始终抓住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实行结构优化的 适度增长战略	284
熊映梧主要著作	287
参考文献	288
后 记	291

第一章 熊映梧的经济观^{*}

全球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俄罗斯哲学学会第一副会长 A. H. 丘马克夫强调指出：“很清楚，哲学通过形成人们的世界观，对这类决策的研究形成过程产生间接的影响。不管这门或那门学科解决的是什么样的具体问题，对于与这些问题相伴的各种过程、现象，也就是对于整个局势（包括最终结果）的哲学观点，永远是解决这些问题必不可少的条件。哲学是某种最宽广的、超出自己学科范围的对于该学科的对象及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的整体性观点，它同时也反映了其他知识领域的最高成果，离开哲学，无论是重大发现，还是整个学科本身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为此，本书前三章从哲学视角，学习、研究、认知、评价、阐释和总结熊映梧教授在创建生产力经济学、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中国改革发展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功绩。

一 《我的经济观——生产力首位论》

熊映梧教授的《我的经济观——生产力首位论》原载《我的经济观》（第2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后又发表在《生产力研究》1993年第1期。下面是全文摘录。

我在中国经济学界首次提出：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依据这一基本观点，我们创立了另一门理论经济学——生产

^{*} 本书中出现的“我”或“我们”，除特别说明外，均为熊映梧先生自称。本书叙述忠实熊映梧先生著作原文。故注明文献出处，以便读者查阅。

力经济学。历史经验表明，可以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就必须有发达的生产力。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奇怪的是，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界及政界，长期忽视生产力，热衷于生产关系的不断革命，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遭到重大挫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吸取这个教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为了实现这个根本任务，必须认真研究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特别是深入调查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提出有根据的中国经济发展对策。我不赞成高速度经济发展战略，早在80年代初即提出“两种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和“结构优化的适度经济增长”战略。

我在中国经济学界第二次标新立异地提出“《资本论》也有历史局限性”的观点，力主根据新情况，大大发展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就是对《资本论》原理的重大修正和发展。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改革，也是史无前例的创举，自然将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亿万人民的伟大社会主义实践，不是使工人阶级的思想贫困化，而是丰富化、多样化。

我的余生将贡献给寻求中国富强之路，创作《中华国富论》。近代中国先进人士苦心探索国富的途径，可惜不少人犯了抄袭外国模式的错误，先照抄欧美模式，后照抄苏联斯大林模式，吃了大亏。中国经济学家应当有自主意识，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双腿走路，首先弄清中国国情，进而充分利用外国的先进经验、科学理论，从中寻找一条符合本国传统与现状的强国富民之路。这应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我已年过花甲，力不从心，但愿更多的青年有识之士来研究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我从1953年开始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但在1978年以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少发表论著；而在80年代，出版的专著有9部（其中合著4部）、发表的论文逾百篇，有些同行说我是“多产作家”。其实，我的经济观可归结为一点，即“生产力首位论”。

我认为，学问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知识，即前人创造的种种观点和见解，搜集和整理的资料和文献，等等；另一部分是新创造的理论 and 观点，发掘出来的新资料，为人类知识宝库增添的新内容。光有知识，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还算不上合格的学问家。当然，知识不足谈不上创新。我对我自己，对我的学生的要求是：一要有知识，二要有见解。作为一个科学家，不仅要了解本门学科及相关学科已有的知识成果，更重要的是要对本学科做出贡献。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几十年的研究成果，的确只有一条：生产力首位论。以下我将以此论为核心命题，从各个侧面阐述这个真正属于我自己的知识和创新的见解。

二 三十年观察与思考的结论：必须牢牢抓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

经济学是一门务实的科学，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50年代前期，经济建设比较顺利发展的时候，像我这样的一位经济学界的初出茅庐者思想极其幼稚，书本上和报刊上讲什么都信，很少提出疑问。“大跃进时代”，我为“美好的前景”所激动，写过一些文章宣传“共产风”。60年代初的现实教育了我，“饿肚子”使我的头脑冷静下来，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地思考了一些经济理论问题；“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更是让我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宝贵知识。这些个人和社会都交了巨大学费才换来的深刻教训主要是：搞社会主义必须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不放。

1980年11月，我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严格按照生产力发展规律办事》这篇学术报告中明确指出：“积三十年的教训，我们一切工作都必须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大不一样……他们设想的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很发达，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公有制，实现公有制与社会化是相适合的。”历史的进程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并不一致，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出现。这就给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一

项特殊的艰巨的任务：在经济文化上尽快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像列宁所讲过的：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归根结底，就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可惜，我们不是遵照生产力发展规律去实现上述的历史任务，而是靠生产关系的“不断革命”、靠“大跃进”、靠土法大炼钢铁、深翻地、放高产卫星，等等，企图在几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甚至现代化，很快实现“赶英超美”的空想目标，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天堂。大家看到的是欲速则不达，“大跃进”一类的蛮干，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使中国长期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致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元气大伤。

我在《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重要理论根源》一文中强调指出两点：一是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乱改生产关系；二是破坏生产力系统内部的结构乱搞建设……我在《生产力经济概论》一书中写道：“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也会阻碍生产力发展，甚至破坏性更大”。实践已经作出回答：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会造成很大破坏，“超越”越多，破坏性越大。

30多年忽视发展生产力的后果，集中表现为：我国仍然是一个穷国。跟旧中国相比，新中国只不过是贫穷程度有所减轻，至今我国还是第三世界的一员。在《论穷与富》的论文中，我写道：“贫穷与富裕，在我们这个时代尖锐地并存着。社会主义国家能否消灭普遍贫穷的社会弊病，是决定社会主义成败的大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穷社会主义是无力战胜富资本主义的……在《用发展观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的“后记”中，我写道：“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通篇突出了发展生产力这个主题。报告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现状，并以此为基本依据，确认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落后的阶段，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阶段，也就是大大发展生产力的阶段。因此，在初级阶段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我还特别强调了党的十三大报告确立的“生产力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很遗憾，中国经济学界长期忽视生产力。形象地说，不少人是一只眼睛盯着生产关系，另一只眼睛闭着，或者藐视生产力。我曾经在

1980年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致命弱点就是忽视生产力。身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不甚了了。对于中国经济问题还有什么发言权呢？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由此引起了当代资本主义许多新变化，并且形成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如果再固守以19世纪生产力状况为基础而形成的过时观念，用以观察和处理国家问题和国内问题，就难免发生严重的错误。痛定思痛，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发展生产力，尽快地改变和解决“穷社会主义”的境况。

由此可见并充分证明了我近十多年来专心致志地研究生产力，不是由于职业偏好、个人兴趣或钻冷门，而是深感于时代的需要和国家的使命，这是总结了历史教训而得出的哲学认知和必然选择。

三 第一次标新立异：提出生产力首位论

我在经济学中经过了近30年的艰苦摸索和哲学反思，悟出了一条真理，形成和坚定了一个哲学观念，即经济科学必须把生产力研究放在首位，作为核心和根本。

《经济学动态》1978年第11期发表的《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我含蓄地提出：“当前在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中应当把研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放在首位。”文章写道：“既然生产力是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那么，生产力当然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认为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生产力才能发展，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生产力就不发展，实际上就否定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这些年来，许多事实证明，不承认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好多基本经济理论问题就搞不清楚。”当时的《经济学动态》是一份发行范围甚小的内部刊物，巫宝三老先生曾问：“这篇有新见解的文章为什么不能公开发表？那时，鼓吹经济学研究生产力还是犯忌的，所以一般学术刊物不敢发表这类‘异端邪说’。”

在1980年1月2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我的《经济学科杂谈》一文中，比较鲜明地再次强调了研究社会生产力问题。我明确指出：本